

东亚国际移民:趋势与政策

□[澳大利亚]Charles W. Stahl/著,殷鹏/译

[摘要] 回顾了东亚的国际劳工移民的动向和原因,并将注意力转移到东亚的国际劳工流动引起的一些政策变化:提高劳动力输出纯收益,重新整合回国劳工,劳力出口的再构建,推进和控制劳动力招募和保护劳工移民。最后做出了一些结论性的预测:越来越多的人到其他国家追寻赚钱的机会及更高质量的生活。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亚太地区经济整合性的增长、交流与传媒系统的扩大和交互联系、教育与培训的国际化、交通的日益简易和方便、收入差异、就业机会以及变化的环境等。

[关键词] 东亚;国际移民;劳力出口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08)02-0009-11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East Asia : Tendencies and Policies

Charles W. Stahl , YIN Peng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Australia;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 This paper reviews the tendencies and causes of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in East Asia , and notices the corresponding changes in policies in this region , such as improving the net profits of labor export , reorganizing the repatriate labor forces , reconstructing labor export system , controlling recruitment of laborers , and protecting migrant workers. Then it makes a conclusive prediction that more and more people will go to other countries to seek money-making opportunities and higher - quality life. The underlying causes include the increase in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Asia - Pacific Region , the expansion of exchanges and media systems ,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 the increasingly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 income gap ,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

Key Words : East Asia ;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 labor export

一、引言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无论从规模、方向还是在特点上,东亚的国际移民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该地区的移民形式多样——旅游、学生、难民、家庭团圆、劳工和商业,由经济推动的移民,特别是短期移民急速增长。对于该地区各个国家(地区)来说,在不远的将来,劳工移民会日益增多。

本文的第一部分,回顾了东亚的国际劳工移民的动向和原因;接下来将注意力转移到东亚的国际劳工流动引起的一些政策变化:提高劳动力输出纯收益,重新整合回国劳工,劳力出口的再构建,推进

和控制劳动力招募和保护劳工移民;最后做出了一些结论性的预测。

二、动向与原因

东亚国家(地区)在经济和人口上的特点有很大差异。例如,越南人均 GNP 只有 310 美元,劳动力增长率却高达 2.1%。与之相比,日本的人均 GNP 达 38 160 美元,比越南高出 123 倍,劳动力增长率只有 0.6%(该数字为 1997 年统计。劳动力平均年增长率从 1980 年计算至 2010 年)。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韩国、新加坡、香港、台北二者这些变量值也有

很大的差异。

东亚经济的地区不平等明显,产生了大量资金和人力的流动。资金流动的主要形式是外国直接投资与合资,方向大致,但不局限于从该地区的较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同时,这些不平等也产生了该地区内大量的劳工移民,移出或移入东亚地区。因此,该地区的动态经济导致了劳工移民的产生,而近年来地区贸易和投资的急速增长又巩固了这种动态经济。

在早期的后殖民和后二战时期,东亚几乎没有大的人口流动。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济原因产生的国际移民对该地区国家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从表1中可以看出,1980年,东亚劳工总数不到400 000人。到了1990年,这个数字超过630 000,从1990年至1998年间,这个数字又上升了2倍,达到1 327 592人。这些数字中不包括表1中所列国家的秘密移民(clandestine migration)数量,这个数字相当大,也不包括劳动力输出市场中少数东亚输入国的正式招工。

表1 东亚国家劳工移民数量(1980~1999)

来源	1980	1990	1994	1998~1999
中国	-		17 397	23 191(1998)
印尼		3 455	141 287	380 173(1999)
菲律宾	16 186	86 264		
陆地	157 394	334 883	565 226	640 331(1999)
海洋	57 196	111 212	154 376	196 689(1999)
韩国	146 436	-	-	-
泰国	21 484	63 024	169 764	191 735
总计	398 696	631 519	1 249 653	1 327 592

数据来源:中国的(Hou, 2001);菲律宾:海外就业管理局(POEA),未公布数据;泰国:劳动部,未公布数据;印尼:人力部,未公布数据。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亚洲移民的目的地主要是中东和北非的石油出口国家。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1980年,东亚大部分劳动力输出至中东和北非(1980年,韩国也向中东和北非国家输出了大量劳工,以此作为“转键”工程的结构组件。1980年,这个数字超过146 000)。1980年,约90%的菲律宾劳工和70%的泰国劳工输出至中东和北非。到1990年的10年中,中东和北非的重要性开始下降,而东亚的重要性随之上升。到1998年,这两个目的地对印尼和菲律宾的重要性基本平等。到1998年,其他亚洲国家的合同劳工中,印尼和菲律宾劳工分别占了48%和39%。

在东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向中东和北非输出的劳动力数量持续增长。1998年,近227 000名

菲律宾劳工和近194 000名印尼劳工被输送至中东和北非。近年,泰国输入中东和北非的劳工数量急速减少。1988年,只有近92 000名。到1998年,降至18 000人(来自输出国的未公布数据)。与此相比,1980年,只有近24 000名来自东亚的合同劳工通过官方渠道输入至亚洲目的地(该数字的基础是官方统计数字,并忽略了一大部分秘密移民。这些秘密移民从1980年开始并持续至今。下文将讨论这个问题)。到1990年,输入其他亚洲国家的劳工数量增至225 000名。最新统计(1998)表明,每年输入劳工的数量将继续增长,很可能接近570 000名。所有证据都表明这个数字将继续增长,前提是必须加上每年的非法劳工,他与每年合法劳工的数量相等。

表2 移民MENA和东亚的国家(百分比)

国家	中东和北非(MENA)			东亚		
	1980	1990	1998	1980	1990	1998
印尼	71.1	56.5	51.0	7.6	38.7	48.0
菲律宾	89.9	65.1	40.3	11.3	27.1	39.3
泰国	96.6	43.3	9.3	3.4	47.1	87.1

数据来源:菲律宾:海外就业管理局,未公布数据;印尼:人力部,未公布数据;泰国:劳动部,未公布数据。

该地区劳动力流动的重要特点是东亚输出国劳动力流动的女性化(feminization)。1998年,新签约的菲律宾劳工中,近61%是女性,印尼劳工中81%是女性。1996年,台湾有200 000名外来劳工,女性占26.7%,而香港的外来劳工中女性比例超过90%。1994年,有59 352名非法外来劳工滞留日本,32.6%是女性。到目前为止,菲律宾输入日本的合法劳工中,大部分是女性。到1998年1月1日,日本的276 810名超时劳工(overstayers)中,46%是女性。

三、劳工移民的数量

表1和表2说明的是每年官方组织合同劳工数量。特定时间、特定国家外来劳工的实际数量迥异。外来劳工的实际数量不仅包括当年输入的劳工,也包括那些居留时间超过协议规定时间一年或更长时间仍未回国的劳工,还包括输入国工作的非法劳工。表3从输出国和输入国两个角度,估算了东亚和海湾国家(GCC)中亚洲劳工的数量。接下来,我们将注意力转移到东亚输入国的经济。

(一) 马来西亚

表3显示,马来西亚的外来劳工数量最多,接近180万,占其劳动力总数的20%(对马来西亚外来劳

工数量的估计差异很大。笔者估计有 220 万,有一半未登记。沙巴州政府估计有超过 50 万名非法劳工移民(Asian Migration News,1999 年 6 月 16~31 日),印尼是这些外来劳工的主要输出国,其中 50 %的劳工未登记。孟加拉也是马来西亚的外来劳工主要来源之一,1998 年,约有 224 213 名孟加拉人注册为外来劳工。1998 年,从孟加拉输入了 606 291 名注册的外来劳工中,38.1 %在制造业工作,19.2 %在

种植业,16.8 %在建筑业,16.3 %在家政服务业,9.7 %在服务业工作(位于吉隆坡的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提供的未公布数据)。到 2000 年底,总共有 697 000 名登记的外来劳工以类似的比例分布在各行业,加上约 100 万非法劳工。其中,518 000 来自印尼,129 000 来自孟加拉(Asian Migration News,2000 年 12 月 31 日)。

表 3 东亚劳工移民数量(输出地、输入地、年份、千人)

来源	目的地											
	文莱 1996	东马来西亚 1998	西马来西亚 1998	新加坡 1997	泰国 1997	香港 1997	日本 1997/98	韩国 1998	台湾 1998	东亚 总数	海湾合 作组织	国家 总数
亚洲总数	69	478	1284	452	943	438	410	159	283	4516		7503
南亚	6		247	68	50	35		7				
非法			258				10	11		692	2987	2092
印尼	2	170	340	18		37	3	1				
非法		120	355					1				
马来西亚	26			194		15	50		22	1070	1400	1570
非法							10		1	296	500	296
菲律宾	10	96	11	77		134	20	4				
非法		83	10				40	6	114	609		1631
新加坡	1								4			
非法										1	1022	1
泰国	22		10	68		25	15	2				
非法			8				30	3	133	321		366
中国						170	31	36	5			
非法					200		35	53		525	45	525
韩国							7					
非法							63			70		90
日本						21						
非法										21	20	21
其他亚洲国家	2		5	27		1	6	14				
非法		9	40		693		90	21	2	911		911
西方国家	1	5	41	55	32	121	177		1			

说明:a.主要是缅甸、老挝和柬埔寨。b. Western countries 不计入亚洲总数。c. 海湾合作组织(GCC)成员国是: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d. 对于几个国家经济来说,公布数据是指外国人总数,包括非独立的。在这些案例中,假设劳动力参与率是 55 %。e. 韩国合法劳工的来源国比例是根据其超时者国际比例估计的。

数据来源:文莱:Pejabat Buruh(未公布数据);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未公布数据),Kassim(1998);新加坡:Hui(1998:187~218),Wong 提供了新加坡外来劳工的国际分布信息;泰国:Chalamwong(1997:297~312),国家统计局办公室(National Statistics Office)(未公布数据);香港:政府统计处(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未公布数据);日本:Watanabe(1998:235~254)(Asian Migration News,15/3/1999);韩国:Park(1998:219~234);台湾:职业训练局(Employment and Vocational Training Administration)(未公布数据),Lee(1998:145~170);海湾合作组织:新闻报道,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劳动力增长率持续下降,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紧张。1997~1998 年的金融危机中,政府做出回应,宣布要将遣返一部分外来劳工,数量与预计的失业人数相等。起初,有人估计 1998 年大约有 100 万人失业,因此政府应当遣返 100 万名外来劳工。然而,像韩国一样,遣返外来劳工的努力与持续的行业特殊技工缺失相矛盾,安置劳工与遣返外劳工之间有关后勤的问题也有同样的矛盾。下文我们将深入讨论,金融危机导致外来劳工的边缘化减少,这个事实表明,对外来劳工的依赖有着深层结构的渊源,即对外来劳工的需求不是一个过渡时期的现象,它不会因经济结构变迁而被抛弃。

(二)新加坡

新加坡有 45 万名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劳工,另外还有 5.5 万名来自非亚洲国家的劳工(最近数据表明,1999 年 5 月的移民总数为 53 万)。这些外来劳工占据了其劳动力总数的 27 %,比 1990 年公布的数字要高出两倍多(Pang,1992:8)。其中约 8 万人拥有高技能的或专业技术;约 20 万人是建筑工人;10 万人在家政业工作;其余的在服务业或者海水业(marine industry)(SMC,2000)。新加坡经济向更高附加值的产业结构转变,这是其对高技术外来劳工需求的根源。的确,持续的转变和增长是非常依赖于这类人员的引进。例如,统计局(Department of Statistics)估计,没有外来高技能工人,1996

年的 GDP 增长将是 5.3%,而不是现在的 7.5% (SMC,2000)。尽管如此,到目前为止,吸引大部分外来劳工的还是新加坡的低技能工作。

1990 年 3 月之前,政府只允许三个行业雇佣外来劳工,即宾馆、建筑业和制造业,制造业包括造船。然而,从 1990 年开始,服务业得到允许,可以雇佣马来西亚劳工补充其 10% 的劳动力需要。受益的产业包括零售业、银行业和社区服务。1990 年,建筑业和造船业被允许雇佣总数 50% 的外来劳工。这个配额从此增加了。

尽管希望“升级”其经济结构和劳动力技术水平,但是新加坡的许多产业还是严重依赖低技能外来劳工。特别是家政服务业,吸引了菲律宾、印尼、斯里兰卡和其他国家成千上万的外来劳工。尽管如此,政府还是希望通过低技能和高技能之间不同的税收差别来提升外来劳工的质量。最近,新加坡政府实行了一系列尝试以提升建筑业工人质量,包括规定该行业至少 50% 的外来劳工要通过一项基本技能测试 (Aris, M., 1999:12)。看起来,新加坡持续迅速增长的经济与缓慢增长的劳动力二者注定是新加坡在可预见的将来,继续遭受有关劳动力短缺带来的影响。

(三) 香港

在亚洲新兴工业经济 (Asia 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NIEs) 中,香港吸收了最多的外来劳工。1997 年,来自其他亚洲国家的劳工数量达 43.6 万,来自西方国家的达 12.1 万 (基于所有居住签证相关的工作签证的比例,外来劳动力参与率超过 89%。这暗示出外来劳工总数约为 49.6 万)。菲律宾是其最主要输出国,达 13.4 万,其中大部分是在家政业工作。自 20 世纪 80 年代,香港劳动力市场就十分紧张 (Skeldon, 1995:543~554)。对特别是建筑业和家政业工人的过剩需求导致底层缺失。1997 年香港回归中国后,劳动力市场的顶端出现了高技能和专业技术工人的大批离去,他们担心在大陆统治下工作前景黯淡。香港刚回归的几年里,每年流失的这类劳工约为 6.2 万人 (Skeldon, 1995:553)。他们主要流入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去年 (2000) 的人数急剧下降,只有 11 900 人离开香港 (Asian Migration News, 2001 年 1 月 31 日)。

亚洲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香港,导致了一定程度的失业。尽管如此,一些产业仍然面临着劳动力缺失,纺织业、捕鱼业和水产业 (Aris, M., 1999:4)。随着经济复苏,香港对外来劳工的依赖将会继续。有一个缓和的因素,原先外国劳工充斥的低技能工作将只能留给来自中国内地的中国人。

(四) 日本

日本有近 41 万名外来劳工 (不包括韩国居住者),但与其 65.60 万的劳动力总数相比只是很小一部分。尽管如此,外来劳工问题,特别是未登记劳工,是日本媒体和国家争论的主要问题。据统计,1997 年至 2010 年间 (World Bank, 1999a:51),日本劳动力年增长率约为 -0.3%。如果劳动力供给适应需求增长的话,日本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将依赖于这些外来劳工。

在某种程度上,外来劳工缓解了劳动力短缺带来的问题,至少是专业技工的短缺。然而,对于蓝领工人的大量缺失来说,外来劳工没有起什么作用。因此,那些无法挽留员工的公司会从任何地方寻找劳动力,逐渐导致非法劳工的产生。到 1999 年底,共有 25.2 万名超时劳工 (Asian Migration News, 2001 年 2 月 16~28 日),加上没有劳工签证 (non-work visas) 的工人,可以想象,非法劳工总数将超过 50 万。最新统计数据表明,韩国的超时劳工最多,有 52 854 名;菲律宾位列第二,42 627 名;中国第三,38 957 名;泰国紧跟其后排第四,38 191 名 (Korea Link, 26 October 1997)。非法外来劳工的性别分布 (gender distribution) 很有趣。泰国和菲律宾的女性非法劳工多于男性,而其他国家则是男性劳工占很大比例。非法劳工的职业分布为,男性主要是在建筑业和制造业,而女性则主要在管家、服务员和妓女。

日本政府曾秘密地尝试将非法劳工合法化,施行广泛的“训练项目 (training programs)”。来自其他亚洲国家的劳工进入日本后的一段时间或部分时间内,接受“在职训练 (on-the-job training)” (Oishi, 1995:367~386)。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 (Japan's Federation of Employers, NIKKEIREN) 一方面赞成在知识和技术领域开设更多训练内容,另一方面却支持政府对低技能劳工进入严格限制。然而,几年后,政府改变了态度。1993 年 4 月,决定引入 10 万名外来劳工,在两年的职业训练后,进入私人企业工作 (Asahi Evening News, Japan, 16 June 1992)。这同以往严格限制低技能劳工的政策大相径庭,暗示了政府制止非法劳工移民过程中的失败。

(五) 台湾

几年来,台湾劳动力增长缓慢,而需求却日益增长,从而导致了劳动力短缺。外来劳工的引入部分缓解了这个矛盾,到 2000 年底,台湾共有 326 519 名合法外来劳工 (Asian Migration News, 2001 年 1 月 31 日)。1998 年的数字表明,大部分来自泰国 (49%),然后是菲律宾 (42%,未公布数据,来自劳委会—CLA)。在职业分布上,近 58% 的外来劳工在

制造业工作,12 %在建筑业,余下的在社会服务和私人服务业(Tsay and Lin,2001:324)。

有数据表明,一些雇主会避开本地劳工,雇佣外来劳工,这样相同的工作可以支付更少的钱。其结果是,劳委会(Council of Labor Affairs, CLA)做出规定,允许雇佣外来劳工的部门,外来劳工数量不得超过本地数量的30%。最近,劳委会准备将外来劳工数量缩减到30万(Asian Migration News,2001年1月31日)。这种政策发展与新加坡类似,规定了外来劳工数量的上限。随着经济将继续迅速发展,毫无疑问,台湾受劳动力短缺的影响会日益严重,对外来劳工的依赖将继续增长。

四、劳动力增长与吸收

在经济持续增长的背景下,日本和新兴工业经济国家经历了劳动力增长速度的急速下降。从表4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劳动力增长速率(labor force growth rate, LFGR)自1980~1987年间已经开始下降,在下一个十年中,将转为负增长。韩国的劳动力增长率有可能会下降一半,新加坡、台湾、泰国和香港的劳动力增长都有可能下降。

表4 劳动力平均年增长率(百分比)

	1980~1987	1997~2010
劳动力输入国净增长率		
日本	1.0	-0.3
中国香港	1.8	1.0
韩国	2.3	1.2
马来西亚	3.0	2.8
新加坡	2.3	0.6
中国台湾	3.1	1.4
劳动力输出国净增长率		
缅甸	1.8	1.3
柬埔寨	2.6	2.4
中国大陆	1.8	0.9
印度尼西亚	2.9	2.1
菲律宾	2.9	2.5
越南	2.5	1.7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orld Bank, 1999b:50~53)

劳动力增长率下降的原因是:人口出生率的显著减少、农村劳动力供给的枯竭、追求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参与劳动的比例下降和工作态度的转变(青年人避开低技能劳动)。这些转变已经导致,并将继续导致日本和新兴经济国家的劳力来源差距。这些差距为低收入和低工作前景国家劳动力创造了移民的机会。

表5分析了对缓慢增长的经济和急速增长的劳动力二者对移民潜力的影响,揭示了一个简单又有

意义的结果。它关注非农业带薪工作(paid employment)及其劳动力的增长率。然后将其与劳动力年增长率作比较,目的是在过去的基础上,估算有多大比例的劳动力新增人口会选择非农业带薪工作。表5中列出了主要劳动力输出国和东亚劳动力输入国,其中,只有孟加拉是非东亚国家,因为它是东亚劳力的主要输出国。

表5 对缓慢增长的经济和急剧增长的劳动力二者对移民潜力的影响

A 国家	B 非农业工作 比例(占总工 作百分比)	C 非农业工作年增 长率	D 劳动力年增 长率 1995~ 2000 (百分 比)	E 每 100 名新 劳力中非农 业带薪工作
孟加拉	29.3(1990)	4.1(1985-90)	2.1	56
中国	25.8(1993)	6.5(1989-93)	1.1	154
印度尼西亚	42.8(1992)	1.8(1985-92)	2.5	30
菲律宾	50.6(1994)	4.0(1985-94)	2.7	75
泰国	38.5(1991)	10.3(1985-91)	1.3	307
越南	11.7(1991)	-2.0(1990-95)	1.7	-13

说明:1. B 栏乘以 C 栏再除以 100,其结果再除以 D 栏乘以 100 的积,就得到 E 栏的结果。2. 中国的非农业工作数据没有得到。

数据来源:国际移民办(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1998a, 1998b);世界银行(World Bank, 1999)。

表5中的E栏很关键。它说明,在过去经济发展和劳动增长的基础上,孟加拉只能为每100位劳动力新工人提供56个非农业工作。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这个数字分别是30和75。这三个国家的农业无薪工作和城市非正式工作的劳动力大量减少,而这些行业正排队等待带薪工作。越南在这段时间里创造出的非农业带薪工作太少,增长率呈负数。与此相比,中国可以为100名新劳动力创造出154个非农业带薪工作。然而,尽管这个数字远远高出印尼和菲律宾,农业部门中仍有大量未充分就业的人需要被纳入带薪工作中。据估计这个数字约为一亿。依照中国现在创造非农业带薪工作的增长率,要吸收过剩劳工到生产部门还需要很多年。因此,压力还将持续一阵。

很清楚,减少移民流失的关键是降低劳动力增长率的同时制定有效的发展战略。然而,表5表明,亚洲的主要劳动力输出国在达到他们的移民“转折点(turning point)”之前,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一) 政策问题

1. 提高劳动力输出的纯收益

20世纪70年代的关于劳动力输出的正统观念是认为它对发展的影响很小,因为相关的数字很小,并且工人收入大部分在海外消费。然而,随着国际

这部分讨论的一些问题在Hugo, and Stahl, (1998)的论文中也有涉及。

劳工移民的增长,它与传统的出口互相争夺外汇主要来源的位置,在发展中的潜在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现在普遍认为劳动力输出有一些积极意义,能够作为更多传统发展策略的附属。特别是:

(1) 汇款明显地增加了外汇收入,提供了主要的投资资金,也可以刺激本地产业,因为即使是消费开始也可以有乘数效应(Stahl, and Arnold, 1986: 899 ~ 925; Stahl, and Habib, 1989: 269 ~ 285 Taylor-retal, 1996)。

(2) 劳动力输入可以在短期或中期时间里缓和失业和不完全就业带来的问题。

(3) 海外工作经验为劳工带来训练和技能,可以为本国发展做出贡献。

(4) 劳动力输出可以加强双边关系,推动其他经济联系的广泛发展。

(5) 劳动力输出可以帮助地方(与国家相对)经济发展。在几乎所有劳力输出国,海外契约工(OC-WS)都是从输入国的某些地区精心挑选的。这些地区经常是该国最穷的地方,也有人指出,在这些地区,汇款在空间上的聚集对该地区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Hugo, 1996)。

2. 汇款

劳动力输出有一定的益处,汇款对输出国的政府和经济是最重要的。一些劳力输出国已经开始引入政策将汇款最大化(Stahl and Arnold, 1986)。一些国家开始将汇款目标列入国家发展计划。其他国家已经实施一些项目,尽可能多的积累其劳工挣得的外汇。

亚洲一些国家有大量海外劳工,临时或永久的。这些国家中多数在本国银行中都设立体系,存储汇款、收集外汇。印度引导海外社区资金来源方面很成功,特别是专业技术人员和商人。所谓的“印侨(Non-Resident Indians, NRIs)”是指那些“新婆罗门”,他们在印度国家银行(State Bank of India)拥有账户,存储英镑或美元,高利息且免税(有些情况仅需交纳很少的税)。另外,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政府实施经济开放政策,外汇投资批准的急速上升,其中包括大量“印侨”开办的海外公司。

在扩大汇款流入的政策中,最近,外汇自由化和交易集团无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即便是无意识的。在此之前,汇率很低,消费品关税出奇的高,大大降低人们通过正式银行渠道转移汇款的热情,取而代之鼓励汇款者以非正式途径将钱寄回。此外,这也鼓励回国劳工带回现金,可以黑市兑换,或者带回享有特许关税的商品,在国内出售以求牟利。

(二) 劳动力输出成本

在每一个亚洲劳动力输出国内部,都有反对政

府输出劳动力政策和实践的声音,在媒体中频繁显现,通常出自议院、宗教组织、非政府组织或者知识分子之口。有时候,反对派举出反例,反驳政府的辩解。他们也有其他的理由,即:

(1) 有人视劳动力输出为本国的“脑流(brain drain)”流出,会导致稀缺技能的消亡,阻碍国家地区的发展。

(2) 许多人关心海外契约工在输入国遭受剥削,特别是妇女在没有能力反抗剥削和虐待的职业中——主要是在家政服务业和娱乐业。

(3) 有人担心劳动力输出会导致本国的经济和政治依赖输入国,本国的国家和地区经济会变得脆弱而无法控制。

(4) 菲律宾有一种说法,对国际劳工移民及相关汇款的依赖产生的感觉是一种“国家耻辱(national shame)”。

劳工移民无疑会给一些移民、他们的家庭、社区和政府带来一些困难。此外,对于一些国家来说,这无法使人们感到国家骄傲(national pride),因为他们的经济增长不够迅速,无法吸引本国劳工补充国内劳动力。尽管如此,我们从上面的表5中可以看到,对于至少一部分亚洲劳力输出国来说,他们几乎无法吸引足够的劳工补充他们的劳动力市场,更不要说他们的失业和不充分就业了。这排除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些劳力输出国降低了他们的人口出生率,在几十年不恰当的发展策略后走上了正确的发展道路。

(三) 重新整合回国的移民

一些劳动力输出国考虑如何重新整合回归的劳工移民,特别是如何使用他们积蓄作生产投资(productive investments)。早期的一些现象表明,多数汇款和回国移民的积蓄不适合做“生产投资”。这些早期的结论引来了很多批评劳动力输出的声音,认为劳动力输出是发展政策的附属。然而,Stahl和Arnold(1986:914)认为:大部分移民是工人,而非冒险的(risk-taking)企业家,他们对自己的投资很谨慎。回国后,如果他们的投资失败了,又没有强大的求助资源,一切都将是徒劳。他们将忍受两年、三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孤独、忍耐单调而无薪的工作。从这种角度而言,期望海外的工作经验能把一个穷困的劳动力转变为企业家的想法是幼稚的。

尽管如此,仍有许多方案鼓励回国人员将其在海外劳动所得进行“生产投资”。这些方案背后,有许多项目支持,提供商业训练和其他的技术性和制度性支持。Saith(1996:32)相信,这些项目并不都是合理的,特别是鉴于很多小企业的失败经历。他进一步说,设计一种“可靠并对投资者友善(inves-

tor-friendly)的机制和方法,可以帮助移民(和其他一些小规模求助者)把资金投入资本市场而避开不合理的高风险”是更合理的。“这种方法可以为国内经济带来强大且承前启后的联接”。Stahl 和 Arnold(1986:916)进一步发展了相似的观点,他们认为宣扬没有把汇款当做生产投资的助推器的做法是错误的。“通过各种来源和渠道收集小额存款给那些需要用钱或投资的人,是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的目的……即使存款(汇款之外)是临时的,在任何时间把它们收集起来都可以为生产投资提供巨额可借出的资金。”

到目前为止,有很多人将注意力集中在回国的劳工移民如何花费海外收入,也有人关心回国劳工的重新吸收问题。Arif(1995)发现,巴基斯坦回国的劳工移民失业率远远高于非移民本地劳工。尽管不同时间的失业率不同,18个月过后,回国劳工移民的失业率还是远高于本地非移民劳工。对孟加拉(Mahmood,1991:238~298)、印度(Nair,1991:19~55)、菲律宾(Arcinas,1991:103~149)和斯里兰卡(Gunatilleke,1991:290~352)的回国劳工移民的研究发现,与移民前相比,回国劳工的失业率远高于其出国之前。Arif(1995)也发现,回国劳工受教育水平和失业可能性之间的一个有趣的统计学关系,回国人员中的专业技术工人和大部分职业的文职工人,他们的失业率更高一些。与之相比,对于农业工人和低技能工人来说,职业再调整却很容易。在不清楚为什么高技能或有专业技术工人会有如此高的失业率的同时,有人提出应该给这些或为这些回国劳工设立就业服务处,长时间的失业会导致海外习得技术的失效。这些技术的失效很清楚是高价值人力资本的浪费。

(四) 劳力出口的重新构建

我们已经讨论了劳动力输出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特别是着重对汇款最大化和重吸收回国劳工进行了讨论。劳动力输入国对劳动技能的需要会改变,劳动力需求的地理资源也会有变化,人力资源发展计划就是对二者的预测,而这方面的政策很少有人关心[在完全讨论了移出移民压力和菲律宾国际移民的背景下,Saith(1995:33~34)识别和讨论了菲律宾预测外部劳力需求方式和把这些列入人力资源发展计划的重要性]。

亚洲在世界经济发展中速度最快。该地区的几个国家经济中,这种增长产生对劳动力的需求,超出该国劳动力市场的承受能力。正如我们所见,这就为该地区劳动力盈余的国家带来机会,补充由增长带来的劳动力特殊技能和地理形式的需求。因此在该地区内部的国际劳动力流动受需求影响很深。一

些国家制定劳动力输出政策,针对满足劳动力流动的需要,保持或加强保证市场份额。实际上,这些劳力输出政策起反作用。

然而,应该认识到这种增长与经济和人口结构的根本改变有重要关系。这些变化引起职业和技能需求的改变,这种改变也将持续下去。如果劳力输出仍然是发展战略的重要附属,正如该地区几个国家,那么劳动力输出国预测到职业技能和地理资源的需求的改变就显得格外重要。劳动力急遽缺乏以及制造业的工资成本压力产生了输入国对生产工人的需求。劳动力输入缓解了该行业的压力,但能支持多久还是一个未知数。低附加值制造业从日本和亚洲新兴国家大规模转移到低收入国家,表明在不久的将来,国外也将不可避免地遇到同样的压力。Saith(1996:33)认为,像菲律宾这样的劳动力输出国应当预测到这种趋势并提供相应的人力资源。

从日本、新兴工业国家和亚洲四小龙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改变职业技能模式向服务转变。在这些经济中,受教育妇女的劳动力参与率(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s)日益上涨,使得对家政服务的需求也上涨了。消费者收入的增长将进一步加大对娱乐业的需求,特别是对饭店的需求。在紧俏的劳动力市场,有技能或受教育的国民会避开这类工作,外来劳工就进入这些职业。在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工业经济国家里,上了年纪的人对老年服务业的需求旺盛,表现在需求退休家庭/村庄和私人房屋做辅助医务人员、厨师、清洁工、司机和园丁等的增长。

应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化有两种办法。第一种是简单地应对和跟随市场需求,把识别市场需求和机会的任务交给个人和招聘机构。另一种是积极地发展这种市场,服务公司为不同的需求提供不同的人才。Saith(1996:35)认为:“这种服务传递(service delivery)的复合模式能够消除人事服务中的污辱,提升工人的自信;他们提供一种契约式的框架,减少虐待,监控客户的责任。”

作为输出国,菲律宾最易于享受这些发展。它有几所国际承认的医学院,可以培养辅助医务人员。此外,知识高普及率和英语的广泛使用有利于国民进入高质量的教育和培训学校深造,反过来,可以指导国民更好地使用潜在有力的劳动力市场。因此,市场分析、劳动力招募和教育培训机构可以密切合作,协助社团服务劳动力输出,提高收益,保证外来劳动力在输入国的尊严和自信。

(五) 推进和控制劳动力招募

不同国家政府参与劳动力输出的程度和方式不同,但一个共同点是私人劳动力输出产业(private

sector labor export industry) 的出现。它由一些复杂的中介机构、旅行社、律师和其他中间人组成,他们都是劳动力输出产业的重要服务商 (Goss and Lindquist, 1995)。政府有必要涉足这个产业,因为这个产业在发动和支持特定类型的工人往特定目的地流动方面起关键作用。招募者和其他中间人不仅在官方登记的海外契约工流动中很重要,在大批未登记劳动力流动中的作用更重要。的确,如果没有私人部门劳力输出产业,后一个体系也不可能存在。这个产业发展得非常完善,在很多国家有很好的组织,有时也涉及顽固的犯罪集团。

劳动力输出国政府已经颁布了一些政策,鼓励本国公民到本国的国外劳动力市场工作。尽管如此,政府对此的承诺仍有变化,关于该战略的本质,他们进一步发展劳动力输出的目标和范围,这些都交由上述私人部门处理。依照劳动力输出,可以将政府策略划分为:希望加强它的人,希望去控制它、希望将其发展利益最大化、成本最低化的人 (Lim, and Oishi, 1996: 35 ~ 36; Abella and Abrera-Mangahas, 1995)。

每个劳动力输出国都在政府体系内部建立了一个机构,影响劳动力输出,尽管作用各异。有些情况下,政府会禁止某几类流动或禁止向某些国家流动。例如,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孟加拉、泰国和菲律宾禁止了派送妇女到无法受劳工法保护的国家作家政业工作。在这些和那样一些案例中,这些禁令或者无效,或者使得海外契约工的境地恶化 (Battistella, 1995: 257 ~ 274.)。为了绕过这些禁令,劳工移民进入了非法移民体系,或者通过第三国绕道至被禁国家。

实际上,很少有劳动力输出国的政府明确允许未登记移民流动到国外。但是,一些政府无法有效禁止非法移民,实际也推进了这种流动。在输入国,这也是常事,尽管识别和遣返非法劳工浩浩荡荡,对雇用非法劳动的公司也有惩罚。官方对非法移民产业的默许扩大了非法证件的制造和流通。Battistella (1995: 266) 指出,“菲律宾缺少有效的措施制止伪造护照和其他证件”。

(六) 保护劳工移民

上文曾间接提到了劳工移民保护的问题。鉴于这个问题很重要,本节将详细讨论。

1. 国内问题

亚洲的劳动力输出国政府参与输出的主要目的是规范和控制。在国家内部,这主要包括组织和招募海外工人的私人部门的注册。不过有证据表明该地区的政府规范几乎无效。招募者的剥削依然猖獗,包括:

- (1) 对准劳工征收过高的费用;
- (2) 错报工人在他国的境遇和报酬;
- (3) 提供伪工作信息;
- (4) 与当地雇主合谋,从工人薪水中拿出超额现金支付招募费用;
- (5) 在他国没有提供足够的支持。

每个劳动力输出国都有一系列规定,规范招募者的行为。他们应当告知准劳工和实际海外契约工所需的费用上限、提供的服务、工作资质等。但是各国执行力度不一。菲律宾是众多劳动力输出国家中规定最详细的国家之一,但是 Battistella (1996) 指出:

非法招募十分猖獗、范围广大,从接收工作约定前的招募、承诺根本没有的工作、超额收取安置费用、勾结替换协议,到放弃证件怂恿跨境偷渡和让工人非法工作和性工作。大量招募者相互争夺有限的海外工作机会,大量劳工愿意被组织出国。这些情况导致制定政策十分困难,该产业也不得不承认了无法制定太多的政策。

2. 国际问题

政府规范劳动力输出的另一个主要方面与保护、支持本国公民在海外工作相关。某些国家被频繁报导剥削和虐待劳工,特别是女性移民,这是其中最困难的问题。该地区几乎没有国家能够满足国民 (constituents)。的确,政府依靠这些问题的程度而存在,这又决定了政府是否全心全意处理这个问题。一些措施值得考虑,也有一些更紧迫的问题:

(1) 工作许可证的发放应当有产业基础 (配额),持许可的移民应该能够在雇主之间随意流动;

(2) 劳工移民能够有自动加入产业或职业联合会的资格;

(3) 劳工移民应当与本国劳动力享有同样的养老金待遇,并且可以在两国之间便利地移动。有一些多边协定应当保护国外劳工移民地权利。联合国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1996) 提出了“保护劳力移民与其家庭的国际协定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另外,有一些国际劳工组织协定保护劳工移民。然而这两个协定无论是在接受国 (receiving country) 和还是发出国 (sending country) 都很少有人响应。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非政府组织 (Non -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NGOs) 在保护海外移民方面十分有效 (Dias, 1993: 199 ~ 222)。

有关保护和推进中、低技能劳动力的国际协定和双边安排很少,鉴于此,劳动力输出国会引入一些单边政策,保障本国海外劳工的福利。然而,它不能

替代该地区劳动力输入国和输出国之间的双边或多边政策。从这个角度来说,总有人定期考虑要在该地区成立劳动力输出国组织。这类组织的一个特定目的是与劳动力输入国合作,制定适当的制度和法律,保障劳工移民的权利,促进他们的流动。起初,这类组织利用各类国际论坛,增进他们的权力为劳工协调基本工作生活条件,并且确保这些条件能够如期实施。

一些劳动力输入国未能成功制定国家法律,或实行有关劳工移民的国际惯例,致使有人提出,追求一种“行为守则(code of conduct)”可能更有效,即一个公司的工作条件:业务、转包商或者持证工人必须遵守的一系列规定(Porges,1996:114~118)。这种规定在总体上针对某一个公司(或产业)的劳动力,并在同样的规定下,保护劳工移民的。另外可以依照某公司或产业在使用外来劳工的情况协调行为守则。按照 Battistella (1996:119~124),行为守则目的在于保护劳工移民,如果把它放在特定职业的背景下考虑,可能会更有效。他说,守则的本质会随职业不同而不同。

为保护外来家政和娱乐工人而制定行为守则可能会特别困难。然而,招募机构或者股东可能会采取一些守则提供有限的保护,并为其员工受相关条款保护而负责。家政和夜总会可能触犯行为守则,就会受到招募者/股东和担保人的阻止。当然,在一对一的雇佣和被雇佣关系中,雇主很难疏忽大意。对于某些产业来说,推行守则会比其他产业更容易。有一些潜在的顾客,反对购买跨国公司的产品,这可能会促使这类公司遵循行为守则。如上所述,为家政工人和娱乐工人实施守则充满困难。尽管如此,世界上很多国家认同国际劳工组织和其他与劳工移民相关的条例。行为守则与其他方法的使用,在保护劳工移民目标的实现中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在有些行业(移民劳力条例有亚洲的斯里兰卡和菲律宾实施)。

在第六届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PECC)的人力发展任务会上,Roldan - Confesor (1997)指出劳工移民的八点国际共识,包括:通过劳工移民达到的核心价值、标准和产出体系协定,恰当和正确的劳动力市场信息;为劳动力提供国际流行技能,规范招募活动和适当的机制;将移民与其家庭整合进入经济主流的活动和条件的标准化。这些共识无疑是详尽的,如果是由政府、商业和劳动力组织采纳,它们将是保护移民及其家庭合法框架的重大发展。

五、结论

越来越多的人到其他国家追寻赚钱的机会及更高质量的生活,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亚太地区经济整合性的增长、交流与传媒系统的扩大和交互联系、教育与培训的国际化、交通的日益简易和方便、收入差异、就业机会以及变化的环境等。随着区域经济的进一步整合,区域性人口流动将变得越来越复杂。对劳力和专家的需求,教育和工作实践的标准化,将激励国际短期移民,进而新政策的出台将成为必要。

考虑到这些变化,似乎类似 APEC 的区域性组织的时代来临了,使得移民政策的新方向同其他地区前所未有的保护性降低相符合。出于其他一些原因劳动力流动的形式化显得非常重要。日本、马来西亚、中国台湾以及其他地区的日报中有很多关于外来劳工产生的犯罪率的增高、疾病、贩毒、暴力、妓女以及其他社会问题的报道。从输入国的角度来说,大众传媒的这些报导降低了外来劳工的人格,导致对外来人口的仇视以及种族偏见。反过来,当应对由这些必须而又不受欢迎的移民所带来的问题时,很明显地会出现司法惰性。

合法移民劳工在各输入国面临各种困境,然而这些困境同非法劳工所面临的相比是小巫见大巫。只有韩国立法规定非法工人和普通工人享有同样的权利和待遇(Korean Herald, 18 August, 1997, Asia Focus, 1994 - 02 - 25)。依照韩国法律规定,外来劳工无论其地位如何,都可以享有工伤赔偿,要求劳动部仲裁要求雇主支付拖欠工资,索取解雇费。因此韩国尝试将移民控制问题与外来劳工权利问题相分离。不幸的是,其他劳力输入国没有这种情况,导致存在大量非法工人被虐待、被剥削事件。

东亚劳动力输入国所面临的劳动力短缺在本质上是结构性的,它源于迅速发展的经济的各种整合,人口生产的降低、农村劳动力供应的枯竭、年青劳动力参与劳动比率的降低和工作态度改变之间的各式组合关系。这些国家的劳力短缺的扩展可以通过工业化退潮的重新定位得到缓解,工业化退潮受到固定资本的限制。除非这些劳力输入国愿意接受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否则他们就必须接受日益增长的外来劳工比例。

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的一个特点是它将进一步刺激国际移民流动。它不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当劳动力短缺导致劳动力流动时这种现象将会消亡。该地区的移民国家必须面对现实并且接受移民以及劳动力政策,这样才能保证外来劳工有尊严有保障地寻找工作。

很明显,如果亚太地区经济想要充分地抓住由贸易自由化、贸易增长以及经济整合所提供的经济机遇,对待移民的传统态度必须改变。大部分移民都是临时性的,但也有许多移民立志长久居住并最终获得公民权利。该地区的政府必须认识到这是不可避免的,并开始着手制定政策,使这一个程序更加便利,保证移民与定居居民同更广泛的社会目标相一致。因此,这个时候所需要的是广泛宣扬劳动力流动相关政策的政治性意愿,特别是针对中、低等技能劳动力移民的政策。一旦做法失败,不但会殃及今后的经济发展,更会有损该地区劳力输入国的国际名声,中、低等技能的劳工普遍深入的问题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

在短时间内,WTO 不大可能真正认识到中、低等技能移民劳工在全球经济增长和贸易扩大中起到的作用。已知这类移民在亚太地区数量广大,分布广泛,也许像 APEC 那样的论坛是时候真正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了,并应设法将其规范化,为其提供便利,提供制度性结构以保护这些移民劳工。APEC 组织的工作议程除了应包括针对移民劳工的便利以及保护之外,还应该同 APEC 本身宣扬的以人类资本形成和该地区公民生活富裕的目标相一致(APEC,1997)。

[参 考 文 献]

- Abella, M. I. and Abrera - Mangahas, A, 1995. Sending Workers Abroad: A Manual for Low or Middle - Income Countries, Employment Department,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Geneva[M].
-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1991. 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1991, Asian Development Bank, Manila[M].
-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1997. 'APEC Leaders' Declaration: Connecting the APEC Community', Vancouver, APEC Secretariat, Singapore[M].
- Arcinas, F. R. . 1991. 'Asian Migration to the Gulf Region: the Philippines Case', in G. Gunatilleke (ed.), Migration to the Arab World: Experience of Returning Migrants[M]. Tokyo: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pp. 103 - 49.
- Arif, G. . 1995. International Contract Labour Migration and Reintegration of Return Migrants: the Experience of Pakistan[M]. PhD Thesi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 Asahi Evening News, Japan[Z]. 16 June 1992.
- Asian Migration News, (various dates) Scalabrini Migration Center, Quezon City, Philippines[Z]. <http://www.scalabrini.org/~smc/amnews/amnews.htm>
- Asis, M. . 1999.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Asia in 1998: A Review of Trends'[Z]. Asian Migrant, 12 (1), 2 - 16.
- Battistella, G. . 1995. 'Philippine Overseas Labour: From Export to Management', ASEAN Economic Bulletin[Z]. 12 (2), 257 - 74.

- Battistella, G. . 1996. 'Employers Code of Conduct and Migrant Workers', Asian Migrant[Z]. 9 (4), 119 - 24.
- Chalamwong, Yongyuth. 1998. 'The Impact of the Crisis on Migration in Thailand', Asia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Z]. 7 (2 - 3), 297 - 312.
- Dias, C. J. . 1993. 'The Role of NGOs i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Human Rights in Asia'[J].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2 (2), 199 - 222.
- Goss, J. and Lindquist, B. . 1995. 'Conceptualizing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A Structuration Perspective'[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9 (2), 317 - 51.
- Gunatilleke, G. . 1991. 'Sri Lanka', in G. Gunatilleke (ed.), Migration to the Arab World: Experience of Returning Migrants,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Tokyo[M]. pp. 290 - 352.
- Hou, Wenruo. 2001. 'China'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olicy',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APEC Member Economies,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JETRO, Chiba, Japan[M].
- Hugo, G. J. . 1996. 'Economic Impacts of International Labour Emigration on Regional and Local Development: Some Evidence from Indonesi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s of the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New Orleans, May[M].
- Hugo, G. and Stahl, C. . 1998. 'Labour Export Strategies in Asia', Working Paper No. 1, Asia - Pacific Centre for Human Resource & Development Studies[M].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Australia.
- Hui, Weng - Tat. 1998. 'The Regional Economic Crisis and Singapore: Implications for Labor Migration'[J]. Asia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7 (2 - 3), 187 - 218.
-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ILO. 1998. World Employment Report 1998 - 99, Geneva[M].
-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ILO. 1998. Yearbook of Labour Statistics 1998[M].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 Kassim, A. . 1998. 'The Case of a New Receiving Countr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Malaysia', Technical Symposium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M]. The Hague.
- Korean Herald, 18 August 1997[Z].
- Korea Link, 26 October 1997[Z].
- Lee, J. . 1998. The Impact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on Foreign Workers in Taiwan[J]. Asia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7 (2 - 3), 145 - 70.
- Lim, L. L. and Oishi, N. . 1996.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f Asian Women: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Policy Concerns', in G. Battistella and A. Paganoni (eds), Asian Women in Migration[M]. Scalabrini Migration Center, Philippines, pp. 23 - 54.
- Mahmood, R. . 1991. 'Bangladeshi Returned Migrants from the Middle East: Process, Achievements, and Adjustment', in G. Gunatilleke (ed.), Migration to the Arab World: Experience of Returning Migrants[M]. Tokyo: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pp. 238 - 98.
- Nair, P. . 1991. 'Asian Migration to the Arab World: Kerala (India)

, in G. Gunatilleke (ed.), Migration to the Arab World: Experience of Returning Migrants [M]. Tokyo: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pp. 19 - 55.

Oishi, Nana. 1995. 'Training or Employment? Japan's Immigration Policy in Dilemma' [J].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4 (2 - 3), 367 - 86.

Otting, A. . 1993.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ILO Conventions' [J]. Asian Migrant, 6 (3 - 4), 78 - 88.

Pang, Eng Fong. 1992. 'Labour Migration to the Newly - Industrialising Economies of South Korea, Taiwa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Conference on Japan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and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kyo [M].

Pillai, P. . 1998. 'The Impact of the Crisis on Migrant Labour in Malaysia: Policy Implications' [J].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7 (2 - 3), 255 - 89.

Pang, Eng Fong and Cheung, Paul. 1988. 'Regional Labour Flows and Singapore', Seminar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ystems, Processes and Policies,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Population [M]. Genting Highlands, Malaysia, September.

Park, Young - bum. 1998.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Foreign Workers in Korea' [J]. Asia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7 (2 - 3), 219 - 34.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PECC). 1998.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Outlook 1997 - 1998 [Z]. <http://www.fec.newcastle.edu.au/~apc/pecc.html>.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PECC). 1999. Pacific Economic Outlook 1999 - 2000, U. S. National Committee for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M]. The Asian Foundation, San Francisco.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PECC). 2001. Pacific Economic Outlook 2000 - 2001 [M]. Asia Pacific Press, <http://www.asiapacificpress.com/public/home.html>

Porges, J. . 1996. 'Developing a Regional Employer's Code of Conduct' [J]. Asian Migrant, 9 (4), 114 - 18.

Roldan - Confesor, N. . 1997. 'Economic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Labour Migration and Standards', PECC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Outlook 1997 - 1998,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 HRD Secretariat, Asia - Pacific Centre for Human Resource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Z].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http://www.fec.newcastle.edu.au/~apc/>

Saith, A. . 1996. 'Emigration Pressures and Structural Change: Philippines', ILO/ SEAPAT [M]. Manila, mimeo.

Skeldon, Ronald. 1995. 'Recent Changes in Migratory Movement and Policies: Hong Kong' [J].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4 (4), 543 - 54.

Scalabrini Migration Center (SMC). 2000. Asian Migration Atlas 2000 [EB/OL]. <http://www.scalabrini.asn.au/atlas/amatlas.html>

Stahl, C. and Arnold, F. . 1986. 'Overseas Workers' Remittances in Asian Development' [M].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0 (4), 899 - 925.

Stahl, C. and Habib, A. 1989. 'The Impact of Overseas Workers' Remittances on Indigenous Industries: Evidence from Bangladesh' [M].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27 (3), 269 - 85.

Taylor, J. E. , Hugo, G. , Arango, J. , Kouaouci, A. , Massey, D. and Pellegrino, A. . 1996.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M]. Population Index, 62 (2), 181 - 212.

Tsay, Ching - lung and Lin, Ji - Ping. 2001. 'Impacts of Labour Importation on the Unemployment of Local Workers: An Exploration Based on Survey Data',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APEC Member Economies [M].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JETRO, Chiba, Japan.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UNPD). 1996.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olicies 1995 [M].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Watanabe, S. . 1998.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Migrant Workers in Japan' [J].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7 (2 - 3), 235 - 54.

World Bank. 1999a.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1999, Washington, D. C. : World Bank [Z].

World Bank. 1999b.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8 - 1999, Washington, D. C. : World Bank [Z].

World Bank. 2001.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 - 2001, Washington, D. C. : World Bank [Z].

收稿日期 2007 - 11 - 20

[责任编辑 黄世杰]

[责任校对 刘秀玲]

[作者简介] Charles W. Stahl (1946 ~), 男, 澳大利亚人,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移民、人力资源和发展。Email: Charles. Stahl @newcastle.edu.au。殷 鹏 (1984 ~), 男, 壮族, 江苏连云港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系硕士研究生。北京, 邮编: 100081。Email: philip. yin @tom.com